

古今诗文精粹丛书

手稿本全编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人间词话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古今诗文精粹丛书



人间词话

RENJIANCIHUA

王国维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词话/田戈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5

(古今诗文精粹丛书) ISBN 7-228-07950-7

I. 人… II. 田… III. ①词话(文学) - 中国 - 近代

②人间词话 - 注释③人间词话 - 译文 IV. I 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4300 号

责任编辑: 丁 璇

责任校对: 郑 军

封面设计: 黄 灏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武汉市佳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8

字数 120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228-07950-7

全套定价: 96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83836540

序 言

邹 天

语言文学是人类文明最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存在。中外古今的好的作品，也即精粹的作品，不仅是人类文明的真实再现，人类的智慧结晶，而且也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好的作品之所以精粹，乃在于它是文化精神极为深刻、极有特征、极其精美的聚光点。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但它的深层潜藏着人们思想行为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生追求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和审美趣味。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在吸收新的社会实践智慧和外来智慧中不断地优化自己，但其核心部分总是带有尊严感和神圣感，并且顽强地显示着一个民族身份，具有各自民族身份证的性质。我国的《论语》所说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史记》中的卧薪尝胆、毛遂自荐；直至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国的《荷马史诗》

中的英雄气概；伊索寓言中的深刻哲理；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奉献精神。如此等等，都成为千古传诵的处世、论学、为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对各民族古往今来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好的作品精粹光润、千锤百炼、声情并茂、朗朗上口，不仅具有久传远播的生命功能，其间还蕴含着深邃的哲理，荡漾着激越的情感，体现着闪光的人格。好的作品说理讲究婉曲，一般不宜直说，而要采取某种“不说之说”的策略，形成富有暗示性的意境，或者耐人咀嚼的理趣。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简直俯仰古今，融入到苍茫的古台旷野之间。这里面隐含的历史哲学，需要细加吟咏才可以感受到。又比如苏东坡《题西林壁》理趣就显豁些，体现了宋诗多思理的特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涉及到认识论问题，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事情，会有不同印象，因此要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甚至借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身的情境，以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尴尬。但是所有这些道理都没有直说，都融合在远近高低直至深入山中的游历观赏之中，令人感到语义双关，意味深长。像这样一些显例，在我们选编的《古今中外哲理诗鉴赏》中比比皆是。

伟大作家高尔基曾说过，“文学乃是人学”。以抒写为核心的文学，讲究合情合理，情理兼备，而且情是更不能割断地联系着人的生命本原。文学所写，到底是人间诸有情，即使是所谓纯粹写景之作，也会在景物的背后睁着一双充满情感的眼睛，有道是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语)。话本章回小说比一些官样文章更胜,在于写了世态人情。走近《红楼梦》,但见情海茫茫,烟波万迭。因此精粹的作品往往能够对人们处于各种精神状态中的思想感情,感而动之,抚而慰之,宣而泄之,激而奋之,使之得到各种形式的升华与净化、涵养和超越。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无不为之激愤难抑;读诸葛亮的《出师表》,无不为之惆怅满怀;读李密的《陈情表》,无不为之哽咽而泣;读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无不为之痛快淋漓。

多读精粹的作品,可以增加才气和灵性,多读精粹的作品,也可以增加骨气和人格。也就是说,精粹的作品,各有千秋,对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滋润是多层次的。比如“岁寒三友”松、竹、梅,是文学作品中较多写到的意象。松不用说,自从《论语》讲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它就被视为坚贞的象征,至今还有《松树的风格》为之讴歌。竹在六朝沾染着名士气,但后来又增加了操守的因素,到了清代的郑板桥又写了这么一首画竹题诗:“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梅在宋朝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中,写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带点“梅妻鹤子”的高士作派;而元代王冕的《白梅》诗写道:“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这里不仅要高洁立身,而且要把清香和春天送给人间,其积极入世的襟怀自然比林和靖高出一筹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更是借梅花的气节和品格,表达了诗人乐观豪迈的浪漫主义情怀。

中国人,特别是当代的青年人——中华民族的未来,更应该

肩负起以本土文化为主脉，广泛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作为民族文化精神聚光点的精粹作品，当可助上一臂之力。因此，我们先期选编了《史记》白文本，《古文观止》注译本，《古今中外哲理诗鉴赏》和《人间词话》手稿本，且名之为《古今中外诗文精粹》。祈望能受到读者朋友的喜爱。书中的不足之处，也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3年5月

前 言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其平生著作达六十余种,内容涉及文学、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且颇有建树。尤其是他的《人间词话》一书,更是集我国古典文学之大成,在我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堪称是一部划时代的学术作品。

《人间词话》自1908年10月到1909年1月在《国粹学报》上刊行以来,版本繁多、屡经删订。由于《人间词话》继承了我国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体现出诗话、词话随意即兴、应机而发的写作特点。因此手稿本将最大限度地保有这种写作的真实,与相对自成体系的众多校订本相比,自有其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然而遗憾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对于众多读者来说难以一睹尊容(按其手稿系写于一旧笔记本上,计二十页。现藏北京图书馆)。因此,我们根据《王国维评传》中的手稿照片(江西百花洲出版社1986年版),参考滕咸惠先生的《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并约请当今知名专家学者,撰写解读文章,进行重新整理校注,出版了这本《人间词话》手稿本全编,力图将王国维手稿的原貌真实地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相信本书能够为读

者把握王国维文艺理论研究发展的脉络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能为读者鉴赏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提供一条捷径。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内容为《人间词话》引和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原文；下卷内容为王国维创作的《人间词》甲乙稿和附录。附录一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之外的零星论词语；附录二是王国维的《文学小言》；附录三是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在此需说明的是，《人间词话》引是对王国维手稿做出的解读；《人间词》是王国维词学理论的具体实践。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手稿来得更切近可靠。手稿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解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手稿是“境界”说的理性思辩，《人间词》为“真性情”的形象演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书有别于同类书籍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

编 者

2003年4月



目 录

前言

上卷

人间词话引 /2

卷首题诗 /25

人间词话 /28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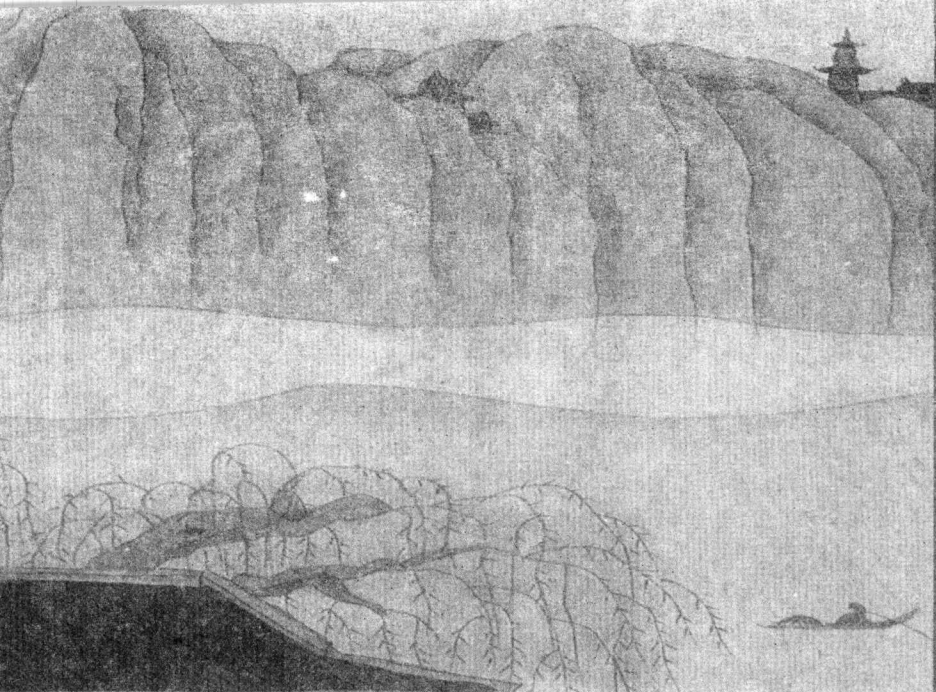
人间词甲稿序 /232

人间词乙稿序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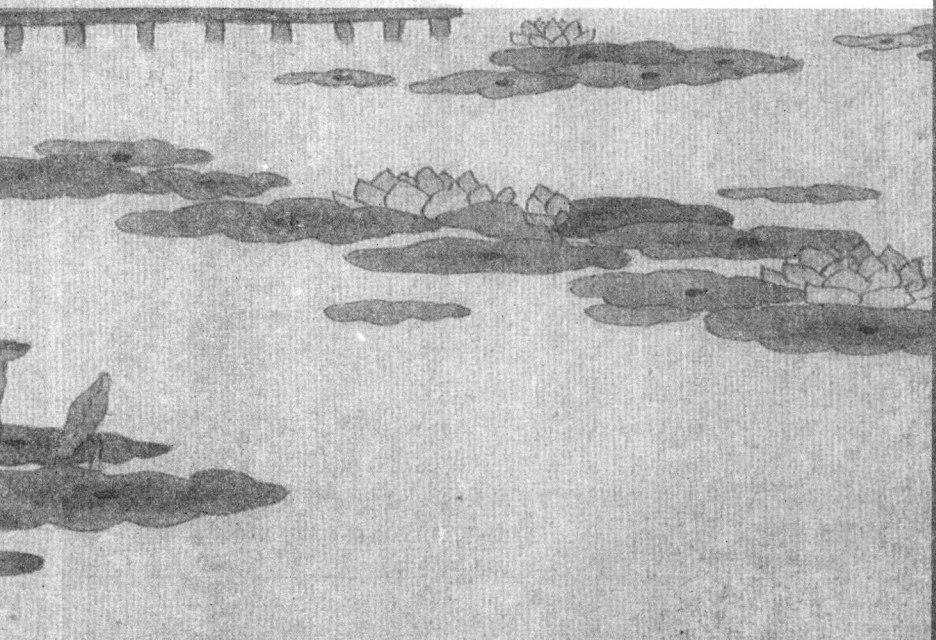
人间词 /235

附录 /282

后记



人间词话引▶



《人间词话》引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一、苦闷忧愤的悲剧人生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生活的年代，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人生理念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的时代。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文集续编·自序》），多病的人生遭遇多难的时代，“优生”和“忧世”一齐积压着他，驱策他不断地去解索人生的困惑，追寻人生的真谛，为疲惫的心灵讨取片刻的安慰和宁静。

王国维的一生，就是对人生问题不断追索讨问的过程。

王国维曾自叙其早年读书经历说：“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篋，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散文骈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静安文集续编·自序》）22岁以前，他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为以后治文史、考据之学奠定了基础。就在此时，他思想中已表现出近代的异端色彩。他不喜科举时文，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终场而归”（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引陈守谦《祭文》），弃帖括八股而不为，表现出鄙薄功名、唾弃利禄、重情多思的人生志趣。

1898年甲午海战后，王国维“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是年，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做文书校对工作，缘罗振玉之力，进入东文学社。此时的东文学社以讲授西方科学技术为务，而王国维的兴趣则偏重于哲学。通过日籍教师藤田丰八、冈田佐治二君，王国维间接得知康德、叔本华哲学。直到

1903年,王国维才开始读康德专著《纯粹理性批判》,“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稍后,读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而“大好之”,称其“思精而笔锐”,读之不己,更广涉叔本华其他哲学论著。叔本华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哲学之所以和王国维一拍即合,一方面是由于叔氏哲学的社会批判色彩,高扬生命意志的异端精神,顺应当时的时势思潮,也顺应王国维少年时即表现出的求新求异倾向,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悲观主义人生论”上,两人有着深度的契合点。叔氏悲观主义哲学可谓深契“性复忧郁”的王国维的心,对王国维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有深刻的影响,也给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抹上一层厚重的悲剧色彩和悲剧精神。1905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全以叔氏为立脚地”,此外像《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等,都是运用叔本华、尼采、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理论来探讨中国文学问题的有名之作。

30岁之前,王国维主要精力在介绍和钻研西方哲学美学。刚跨而立之年,他开始对自己醉心于哲学的人生意义作反省式责问。本来,王国维是非常看重哲学的,他曾说哲学的事业是“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论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而现在呢?“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是位敏锐丰富的审美感情和睿智深刻的思辨理性兼盛的人物。他集诗人与哲学家的气质于一身。“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文集续编·自序二》)两种气质的融合促动,使得他的哲学富有个性和情韵,诗学饱含理性和深度。两者的裂荡冲突,又迫使他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王国维自视颇高,总是以天才自期自许。他省查自己说:“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不能做一个哲学家,又不情愿畏缩为一个哲学史家,所以他疲于哲学。而此时,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引起了另一番人生兴味,改变了他人生求索的路向。王国维超越了哲学的玄思,走进了文学的幻境,在情真美幻、悠闲杳渺的艺术境界中安顿灵魂。在《去毒篇》中他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

大。”希求文学来调理感情的疾病,寄托高尚的嗜好,慰藉饥渴的心灵。

1906年《人间词甲稿》刊行,1908年前《人间词乙稿》也已完成。王国维对自己的《人间词》是十分自负的,给予很高的评价。《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很有自得之意。在《人间词话》中他转述樊抗父称道其《浣溪沙》、《蝶恋花》等词后,夫子自道曰:“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期许《人间词》已探得“第一义处”。又谈及倡和东坡白石韵的《水龙吟》、《齐天乐》,说:“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与古人原作相比毫无愧色。况且,“余之所长则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自信自负之情,溢于言表。的确,《人间词》是王国维生命底蕴的流露,精神生气的灌注,不同于“羔雁之具”,模拟之作,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讨问和思索的结晶。王国维忧郁沉闷的思虑和个性在《人间词》中完全敞开,《人间词》是此阶段诗人心灵之思、情感之动的真实痕迹,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对《人间词》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把握。《人间词》和《人间词话》正是王国维词的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的精粹,两者是相互交融、相互关联的。《人间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丰富的感性经验基础,而《人间词话》是对《人间词》之创作感悟和艺术经验的理性概括和理论引申。两者产生时间大致相同,正好是王国维心灵轨迹和思索历程在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的清晰印记。

王国维《人间词》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宠辱升降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作暂时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也就是说王国维开始摆脱传统的伦理视界的限制,进入一种哲学视界,对人生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王国维的《人间词》浸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他用一双充满忧郁、孤独、悲悯的眼睛审视着世界。词中的自然意象多是肃霜秋风,栖鸦孤雁、鹤唳乌啼、残霞落花,基本主题是人间无凭、人世难思量、人生苦局促。这种慨叹不是古人那种片刻失意落魄后的自怨自艾,而是词人王国维对宇宙人生一贯的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人间”、“人生”。“人间”、“人生”作为诗人体验思索的对象进入诗人的视野。王国维将他的词集称为“人间词”,将他的词话称为“人间词话”,其中似乎暗含着一种人生扣问的哲学况味。

王国维扣问的“人间”、“人生”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呢？他说：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

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鹊桥仙》）

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

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水龙吟·杨花》）

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

人间那信有华颠。（《浣溪沙》）

人间须信思量错。（《蝶恋花》）

掩卷平生有自端，饱更忧患转冥顽。（《浣溪沙》）

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

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偶成》）

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来日》）

人间地狱真无间。（《平生》）

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欲觅》）

王国维的《人间词》旨在揭明乾坤广大、人生须臾这一命定的人生悲剧。人间是一场大梦魇，和地狱没有分别，而芸芸众生，迷失本心，惟务外求，百般钻营，最后不过如过眼烟云，瞬隙永逝。这完全是出自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观而对人生的解读。王国维通过诗词向人们挑明，向尘寰苦求乐土是无望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永远的愁烦和揪心。“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拚飞》）要打消闲愁，求得心安，只有在诗国中、在艺术境界中才有可能。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他词中之“第一义处”，对这种“第一义处”的揭明，也就达到《人间词话》中标举的“真”的境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透过艺术意蕴对他意念中的人生真义进行哲学式的思索参悟，和传统文学中世俗的伦理的世情的思维路向是不同的（当然在传统文学中也有出于道家或禅宗的哲学式玄思，但尚未成为文学主流）。这一点，对于理解《人间词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将王国维艺术理论的哲学式表达，拉回到传统的伦理式表达的框架之中，忽略了《人间词话》的这一理论转向。

撰著《人间词话》之后，王国维开始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这种转变也是受西方文学观念激发的。他自叙其有志于戏曲研究的缘故道：“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

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又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美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王国维鉴于中国戏曲之不振，试图从史的整理入手来担当起振兴中国戏曲的责任。在西方戏剧理论和史学观念的烛照下，结合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他撰著了《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角色考》。1912年以此为基础花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郭沫若称道此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鲁迅和王国维》）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东渡日本，寄寓京都，以清朝遗老自居，在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上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他曾将以前出版的《静安文集》焚毁殆尽以示有悔，在写成《宋元戏曲史》后，就埋头于古文字、古器、古史地的研究，从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王国维此次学术转向和罗振玉有很大关系。罗振玉给王国维的论学书规劝王国维道：

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本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不可为，极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君年方壮，予亦非到衰落，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1916年王国维返回上海后，为犹太哭商哈同编辑《学术丛编》，后又兼任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共长达七八年之棵。正当他在“国学”考据方面成绩辉煌之时，其政治态度却日趋倒退，思想情绪日益悲观。1923年，他欣然“应诏”北上，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欲投御河自尽未遂。次年，愤于“皇室奇变”而遗老们犹“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无异”，决计“离此人海”（《观堂遣墨》卷下三月二十五日给蒋汝藻信）。这时，他被聘任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然心灵上一直笼罩着一层“忧君”“忧国”和“君辱臣死”的阴云。1927年6月，当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时，王国维终于留下了“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一纸遗书，投昆明湖自杀。王国维曾说过：“余平生惟与书